

珞珈史学文库

LUOJIA SHIXUE WENKU

武汉大学文科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资助出版

商周时期 南方青铜器研究

张昌平 著

SHANGZHOU SHIQI NANFANG
QINGTONGQI YANJIU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武汉大学文科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资助出版

商周时期南方青铜器研究

张昌平 著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周时期南方青铜器研究 / 张昌平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珞珈史学文库)
ISBN 978-7-100-12427-0

I. ①商… II. ①张… III. ①青铜器(考古)—研究—中国—商周时代 IV. ①K876.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3172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商周时期南方青铜器研究

张昌平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427-0

2016年10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1 3/4

定价: 60.00元

总 序

“珞珈史学文库”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汇集。第一批推出的是二十多位教授的文集。以后将根据情况，陆续推出新的集子。

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早在 1913 年，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设置历史地理部。1930 年武汉大学组建史学系，1953 年改名历史学系，2003 年组建历史学院。一批又一批著名学者，如李汉俊、李剑农、雷海宗、罗家伦、钱穆、吴其昌、徐中舒、陈祖源、周谱冲、郭斌佳、杨人楩、梁园东、方壮猷、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吴廷璆、姚薇元、彭雨新、石泉等，曾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推动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和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繁荣的同时，在武汉大学和中国史学史上也留下了嘉名。其中，唐长孺、吴于廑两位大师贡献最为卓殊。

改革开放 30 年间，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建设成效显著。1981 年，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获得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1987 年，历史地理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 年，中国古代史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1995 年，历史系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7 年，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1999 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2001 年，中国古代史再次被列为国

2 商周时期南方青铜器研究

家重点学科。2007年，中国古代史第三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世界史新增为国家重点学科。2008年，历史学一级学科入选湖北省重点学科。2001年，以中国古代史为核心的国家“211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中国文明进程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启动。2008年，分别以中国古代史与世界史为中心的“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新资料整理与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研究”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中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研究”启动。目前，历史学院设有历史学、世界历史、考古学三个本科专业；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国际关系与中外关系史和地区国别史等12个二级学科。在研究机构方面，设有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15—18世纪世界史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研究所，以及简帛研究中心、科技考古研究中心。在前一辈学者奠定的基础上，经过后继者的持续努力，逐步形成了严谨的学风和优良的教风，确立了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断代史与专门史、地区史与国别史相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并重的学术特色，成为武汉大学在海内外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之一。

历史学院的老师，在辛勤教书育人的同时，也为科学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各自从事的方向或领域，推陈出新，开拓前行，撰写了一大批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学院决定编撰教师个人的学术文集，是希望各位老师把自己散见于海内外各种出版物上的代表性论文加以整合。这样，通过一种文集，可以约略体现教师本人的研究历程和领域；而于整体方面，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展示武汉大学历史学的学科格局和学术风格。

每本文集的选篇和修订，由作者各自负责。学院教授委员会对入选文集进行遴选，并提出一些指导性的建议。

“珞珈史学文库”的出版，得到了国家“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的支持，得到了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的支持，得到了商务印书馆各位领导和相关编辑先生的支持。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2010年2月

目录 Contents

前 言 1

商时期

盘龙城商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考察 7

盘龙城出土的商代青铜容器类说 20

北美地区所见中国商时期南方或南方特征青铜器 33

论殷墟时期南方的尊和罍 57

商代铜甗概论 76

自产与输入——从纹饰风格看三星堆铜器群的不同产地 97

新干大洋洲青铜容器的年代上限问题 109

虎卣 123

西周时期

噩国与噩国铜器 139

论随州羊子山新出的噩国青铜器 148

叶家山墓地的考古收获 160

论随州叶家山墓地 M1 等几座墓葬的年代以及墓地布局 163

望城高砂脊与酉族 182

2 商周时期南方青铜器研究

东周时期

曾国铜器的分期及其相关问题 187

曾国青铜器简论 199

曾国的疆域及中心区域地域 214

曾国青铜器铭文中“子”、“伯”等称谓问题 240

曾侯乙、曾侯谏和曾侯卣 254

关于曾侯乙尊盘是否采用失蜡法铸造争论的述评 269

曾国为缙一随说 282

随仲嫫加鼎的时代特征及其他 297

“择其吉金”金文辞例与楚文化因素的形成与传播 307

李三孤堆青铜器 319

作者著述列表 331

前 言

历史学家常常面临着政治中心与周边地区材料不对称的问题，考古学研究者则无此烦恼，因此考古学在揭示古代区域性文化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当然考古学家也会有着中心与周边的地域性之分。处于当今政治、文化中心地区的学者多热衷于事关格局的主流文化，而工作于地方的考古学家则需时常面对物质文化的区域性。我本人由于中心地区之外的工作与生活经历，甚至还会觉得区域文化研究更加有趣。如果我们比较不同类型学者的研究习惯，还会发现由周边而及中心的观察方向，更容易聚焦和观察到周边地区物质文化的个性特质，这常常有别于由中心而及周边所得到的文化同一性的观感。另外，中心与周边正是一个社会空间构成上不可或缺的两面，特别是在青铜时代的南方地区，由于青铜矿料资源的特殊性，更多地促成了与中原地区以及与其他区域文化的互动，更多地推动了南方地区自身文化的发展，从而对早期中国国家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如果从南方青铜资源辐射、南方地区文化地位的角度而言，这里本身就是一个中心。推而广之，南方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区域文化的研究，都是改观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都与中心地区有同等的重要性。本文集是以商周时期物质文化的核心——青铜器作为研究内容，从一个边角，来观察当时文化和社会背景。

2 商周时期南方青铜器研究

半个世纪之前，人们对商朝南方的理解差不多仅限于“挾彼殷武，奋伐荆楚”这样的历史文献记载。随着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和发掘，才认识到商时期在南方的文化、政治方面所达到的范围。目前，通过盘龙城青铜器考察盘龙城的性质和地位，已经可以一定程度地感知当时中原王朝对南方控制的方式及途径。在稍晚的殷墟文化时期，新干大洋洲、广汉三星堆等诸多南方青铜器群反映出中原文化已经退缩、南方青铜文化兴起，同时南方地区已经可以独立生产具有个性特征的青铜器。而通过认知这些青铜器的特点，南方不同区域之间、南方与中原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得以揭示。集中于对盘龙城等南方地区青铜器的研究，正是试图以此揭示南方地区青铜器生产及其所折射的与商文化中心地区政治关系，试图通过不同青铜器群观察南方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

西周时期，南方地区青铜器的发现也已开始建立这一地区远较“昭王南征而不复”等文献记载丰富得多的历史场景。目前我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出，西周初期周王朝势力的南下是通过随枣走廊而及江汉地区。较为典型的西周青铜器的发现，在随州的羊子山墓地、叶家山墓地，向南到江陵万城，东南到黄陂鲁台山墓地、蕲春毛家嘴遗址，并进一步辐射到湖南望城高砂脊等遗址。由这些物质文化材料反映的西周早期周文化的南下以及对南方地区的控制，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这样一个轮廓，是在不断地新的考古发现中，由丰富的彼此关联的材料所体现的。文集中对西周时期噩国、曾国青铜器的研究，试图论证上述看法，勾勒出一个西周时期的南国。

东周时期南方地区是楚文化的势力范围，不过，战国之前的楚国中心区域所在，学术界多年来却未曾达成一致意见。而在文献记载的随国之地出现的曾国也是一个未解之谜，这个谜随着最近随国青铜器的出现显得更加扑朔迷离。曾国只是南方的一个小国，但其青铜文化给当代留下的影响却不亚于楚文化，因此在很多时候实际代表了楚

文化的特征。本文集试图从青铜器铭文的角度提出新的追溯早期楚文化的方法,《曾国青铜器简论》等一组关于曾国青铜器的论文,其内容与本人专著《曾国青铜器研究》或者相关、或者属于其主题之外,则是讨论东周时期往往容易被忽视、但又较楚秦等大国更有代表性的诸侯国文化地位和背景问题。

上述内容大体反映了笔者二十年来对南方地区青铜器及其反映的社会背景的认识方向。虽然笔者近年越来越关注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全貌,甚至尝试以全球视野考察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特征,但如文集中由外围到内在、由个体到一般的思路仍然是笔者会保持的风格。这些是笔者所能总结到的文集的些许价值。

最后要感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珞珈史学文库》提供出版这本文集的机会,感谢商务印书馆丁波老师、段珩女士及诸位编辑为文集所做的编辑工作。由于文集在《珞珈史学文库》立项时,我在《60学人文集》中的内容已经定稿,后者集结的《方国的青铜与文化——张昌平自选集》内容和选题较为宽泛,其中的《北美地区所见中国商时期南方或南方特征青铜器》、《论殷墟时期南方的尊和罍》、《关于曾侯乙尊盘是否采用失蜡法铸造争论的述评》、《“择其吉金”金文辞例与楚文化因素的形成与传播》等四篇文章重复出现在本文集中,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商
时
期



盘龙城商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考察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是商代二里冈文化时期出土青铜器的重要地点，这里出土的青铜器多达 351 件^①，数量超过同时期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及偃师商城，是商代前期出土青铜器最多的遗址。由于这批青铜器主要特征与郑州一带出土青铜器接近，而出土单位的级别、组合、年代关系丰富，因之对于探讨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组合、造型、分期等特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盘龙城出土青铜器的年代下限与新干大洋洲及广汉三星堆青铜器大体衔接，它对于探索晚商时期南方地区青铜文化出现的背景也有着积极作用。对盘龙城青铜器的研究，《盘龙城——1963~1994 年考古发掘报告》已有很好的见解，笔者因地利之便，对盘龙城青铜器进行了实物观察，这里就青铜容器再谈一些看法。

盘龙城遗址青铜容器可分炊器与酒器两大类，器类有鼎、簋、甗、鬲、爵、斚、觚、尊、罍、盃、盘、卣等 12 类约 186 器^②，这些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盘龙城——1963 ~ 1994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01 年版。以下引用盘龙城发掘资料如无另注，则均出自该报告。

② 除盘龙城报告中提到的 186 件容器外，武汉市博物馆还收藏有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土的采集品。为便于说明问题，本文涉及器类数量仍采用报告统计数据。

青铜器多数出土于墓葬之中，鼎、鬲等炊器在一般墓葬中或出土一件或不见，它们作为随葬品的出现不稳定。而酒器无论是器类还是数量在铜器群中都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如报告中觚、爵、斚三类酒器就占了 136 件，商人重酒器组合的思想在此阶段就已经开始有充分的体现。酒器在一般墓葬中随葬有一至两套，其常见组合为觚、爵、斚，级别较低的墓葬组合为爵、斚，两套以上的酒器组合中一般觚、爵、斚三器齐备，李家嘴 M1、M2 及杨家湾 M11 等规模较大的墓葬随葬有三套或以上的酒器。酒器组合的套数与墓葬的规模大小密切相关，说明有可能在二里冈文化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殷墟文化那种酒器套数代表墓葬等级的制度。^① 不过由于盘龙城不少墓葬是当地农民发现的，墓葬随葬品的统计数据可能未必完全准确^②，因此对青铜器组合情况难以进行深入讨论。

从造型上看，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容器可分为三足器和圈足器两类，不见平底或圜底器。三足器除爵、扁足鼎为实足外，鼎、鬲、斚、甗、盂等足径较粗的器足均中空，形成腹与足相连的空足，已有学者指出，形成器足中空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尚未解决足内芯范悬浮的技术问题。

爵、斚、盂三类三足器同为酒器，由于器腹一侧带鋬，因此此类器形在造型上腹部形成束腰。爵因为流与角的造型，腹部横截面呈椭圆形，不过一些年代略晚的爵（如杨家湾 M11:57）腹部趋圆，接近殷墟时期爵的圆腹。值得注意的是，爵的三角形实足并非像先秦时期其他三足器那样三等分分布于器底中央，而是两足靠近于椭圆形平

① 殷墟地区墓葬中，墓葬级别的高低不同在觚、爵、斚酒器套数的多寡上有明确的体现。参见杨锡璋、杨宝成：《殷代青铜器礼器的分期与组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报告中少数墓葬统计数据也不准确。如李家嘴 M1、楼子湾 M9 随葬容器数量在不同章节中统计数据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底长轴的两端，另一足与爵鋬相对^①，这样，爵的重心易向外侧倾斜，为解决这一问题，与鋬相对的一足总是做成较其他两足更外撇的形态以加强平衡，但爵的稳定性依然较差，这一问题在殷墟时期的一些铜爵上仍然存在。斚总体造型与铜爵有相似之处，其一是器体均为束腰凸腹，鋬与一足相对，足与腹部过渡突兀。但斚均为圆腹，绝大部分底部近平或略外凸，三足中空与腹部相连，空足横断面多呈四边形，少数呈三角形。爵与斚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二者都设有双柱，爵柱靠近流折的腹口上，斚柱与斚前面的双足位置基本对齐。柱的形制在盘龙城乃至二里冈文化时期其他地点铜器中早晚变化明显，较早的柱体小，横截面为三角形，柱帽不发达，而较晚阶段的柱体较大，伞形帽顶饰有涡纹，柱体的发展至二里冈文化之后的中商时期达到极致^②。盘龙城铜斚均是在三足的中线处合范，三条范缝交汇于腹底中心，交汇处一般设有不规则四边形铜垫片（铜芯撑），这是迄今所见垫片技术使用的最早阶段。盘龙城还出有分裆斚和素面的圆腹斚，后者的形制与二里头遗址出土斚较为接近，代表了铜斚的早期发展阶段，但这种斚一直沿用到二里冈文化时期^③。三足酒器中盃只出土了一件，类似形制的封口盃在整个二里冈文化时期所见不多，过去主要发现于郑州地区。

三足食器有鼎、鬲、甗，鼎与绝大多数鬲都带有双耳，除一例之外，双耳与三足的位置都是一耳与一足对齐，在视觉上缺乏平衡感，这一做法也是二里冈文化及其以前时期双耳三足器的共同特征。

① 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应与爵的特殊造型及为满足造型的合范技术相关。由于器腹以上扁体而其下三足，铸造爵的外范分段组合：上部两块外范下部三块外范，为二里冈文化时期非大型青铜器类中少见的制法。

② 如阜南月牙河出土斚，柱高接近全器的三分之一。参见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4卷，图版56，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该报告将出圆腹斚的白家庄M3定为二里冈上层一期。